

# 建構宏大敘事中的生存體驗

潘綏銘

在大陸，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就是「任人評說」，很少有人會自己說自己，這個是會讓人覺得非常奇怪或者很反感。尤其我們這代人的童年有些「不良經歷」，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挨鬥，上了場就要坦承交代從小做了什麼什麼事，所以對我來說，這次要我「交代過去」，我心理上有點障礙。可是我後來發現原來有些文稿，都是十幾年前寫的，現在用上了，還挺好的。回憶錄這種事，從我們社會學研究來說，我個人是持著非常大的懷疑態度，西方引進的「樓梯理論」就是說，上樓的時候你跟人家說的一段話，下樓後忽然覺得不太好，所以到了樓底之後的回憶就把它變成那個好的了。「回憶」這個東西實在有點難說，現在時髦的話叫做「我們看見的太陽是八分鐘以前的太陽」，也就是說，你現在一切的回憶都是你現在對當年的解釋，而當年是什麼樣，已經忘了，不可能記住了。所以我就把一九九四年寫的一篇文章搬出來，那個時候還比較早，可能真實性稍微多一點。

我的題目是「建構宏大敘事中的生存體驗」，為什麼這麼叫呢？因為我的前三十年給毛主席

席拿走了，後三十年我才開始做自己的事。那麼做什麼事呢？其實就是構建一個宏大敘事，這不光是我個人的興趣，也有當時歷史的需要：因為在文革以後，人們開始反思，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恐怕只能用宏大敘事來解決，個體體驗的東西在那個時代還不行，只能有一些個別的革命先烈，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反毛的一些先烈，他們的故事對人們是有鼓舞的，可是更多的是需要用宏大敘事來建構的東西。

我想先介紹一下為什麼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會出現這樣一種性文化。大家可能都知道，共產黨早期和基督教早期在性方面都是非常開放的，主張性自由、性解放的。第一次性革命就是發生於蘇聯，而不是西方，西方報紙當時的大字標題還寫著「性革命是我們的敵人」。敵人從哪來？來自莫斯科，因為布爾希維克（無產階級）就是搞性解放的。那麼為什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領導之下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這也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以後最近這些年我才慢慢想清楚的。

共產黨早期跟國民黨是親兄弟，完全一模一樣，就是一幫城市小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蔣介石開始鎮壓共產黨，迫使共產黨來到了農村，這幫城市小知識分子來到農村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你怎麼說服農民來跟你鬧革命？打仗，要死人的！至少要離家出走的！農民是最反對這個的，你怎麼說服他？跟他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一點可能性都沒有。所以當時共產黨發明了兩個口號，第一個叫「打土豪」，什麼意思？就是把你恨的人都宰了；第二個叫「分

田地」，就是讓你得到實惠。就靠這六個字，共產黨奪取了天下。

可是這是政治號召，政治號召之後還有一個生活作風上的大問題，就是個人品質的感召力。我們看早年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歷史就非常清楚，基督教跟中國人有什麼關係？聖經裡面連黃種人、亞洲人都沒提到，關中國人什麼事？可是它在中國就能夠傳開，到現在已經占到大陸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已經是相當大的一股力量。為什麼能傳開？早年的共產黨人的回憶錄現在都出版了，他們說都是跟傳教士學的。傳教士來到中國，要講上帝、要講聖經，可是最重要的是，他們扶貧救困、大公無私。一九三六年在山東有一個傳教士，為了傳教，他沒有錢了，也沒有辦法了，就活活的餓死了。這一下，對中國底層的民眾是一個巨大的感召。中國人大多數時候不是你說得對我就相信你，而是因為你這個人好我就相信你，我就會跟著你走。在當時相對腐敗的中國，傳教士樹立了一種清貧、為了理想而奮鬥的崇高地位，所以基督教才能夠在國家的最底層民眾、邊緣地區、大字不識的一些人裡面首先傳播開。

共產黨人早年來到農村，接受了傳教士這樣的經驗，他們在農村開展鬥爭，也是依靠這個做法，道德合法性就建立起來了。首先你的道德優越，那麼你的政治目標就具有合法性，大家就會跟著你走。這裡邊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性」。當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被趕到農村裡去，那麼農民的道德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村裡人有誰跟誰在亂搞關係，這你管不著，這是我們的事，我們也不在乎。可是外來人，尤其是上面的人，不管是哪個政府派來的，如果跟我們村

裡的人搞關係，那我們一致恨你，一定會恨你，你的什麼主張都搞不通。」所以共產黨在那個時代執行了非常嚴格的禁慾主義的條令，直到今天二〇一一年此時此刻，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裡還有一條：「禁止士兵跟當地婦女談戀愛」，這裡說的既不是強姦、也不是結婚、也不是約會，就是談戀愛都不行。當然軍官可以排除啦，但是士兵一定不允許跟當地人談戀愛，這就是當年的遺留。也就是說，你在「性」方面，一定要做得非常好、非常非常清廉，有禁慾主義者的形象，才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援。傳到延安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它就演化為中國共產黨一種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型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走向極端。

文化大革命，說白了，在性方面，就是要求當時的八億中國人都變成共產黨員，而且個個都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在性方面，我個人把它總結為「精神禁慾主義」，也就是肉體上並不禁慾，不但允許結婚，而且生孩子越來越多，文化大革命以後人口幾乎翻了一番；但是精神上禁慾就是「你不能以此為樂」，過性生活沒問題，但不能以此為樂，不能追求它，不能享受它，你只能把它當作生兒育女的必要過程。

精神禁慾主義到文革的時候到達頂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個人是十六歲，初中還沒畢業，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文革的精神禁慾主義是深有體會的。當然最近有些在美國之類的海外學者又開始說文革不是百分之百、不是鐵板一塊，也有各種各樣性自由現象。確實有，我一點也不否認，我們同學裡面就有，但是連百分之一都不到。一種是頂端的，就是高幹子弟，他們

可以有這種自由；再者就是棄民，就是完全被打倒的黑五類的那些狗仔子，他們也可以有這個自由。但是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八中間狀態的普通人民是根本沒有這個東西的。當然這些學者的研究也有價值，不要老是刻板印象，不要老把什麼東西都說成百分之百，可是我們這一代人看了以後都會感覺，我們承認是有這種事，但是絕不是很多。

這個精神禁慾主義的宏大敘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最典型的就像我個人的經歷。一直到了一九八〇年改革開放已經稍微有點開始了，我們有個朋友做買賣掙了一點錢，買了日本的錄像機，那個時候還是很緊缺的，要四千多塊人民幣，相當於現在四萬多人民幣。中國人買錄像機的第一件事幹嘛呢？一定是看A片，可是那個片又很難找，卷盤的帶子又不是原版，每個人互相借，轉錄就掉磁了，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彩色都變黑白了。我們三個三十歲的男人，結婚了也都有孩子，三個人聚在一塊看這玩意兒，看到中間有個鏡頭，那個女的低下去趴在那個男人的肚子上，我們三個人沒一個知道他們在幹嘛。最後是我先猜出來的，我就說不是拿嘴弄哪，我那兩個朋友就簡直暈過去了。我們當時真的不知道，如果是我一個人不知道，那可能是我太笨了，可是我們三個三十歲的中國男人都不知道，不知道有口交這回事，也不知道人類還可以這樣做。看了這個以後引起大家回憶，我就想起來以前下鄉好像也聽農民說過，但是當時不懂，不知道人家說的是什麼，另外兩位也回憶起以前年輕的時候聽過什麼的。所以說，我們是這樣子受到性的啟蒙，當然什麼肛交、同性戀根本都不知道，別說不知道這個詞，

也想不到會有這種現象。

到了文革後，我開始做了這方面的研究，大概前前後後有十位以上的記者來問我：「你當初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甚至還有一位很年輕的記者說：「是不是這是一個薄弱環節，比較好突破，所以你做了這個研究？」我說，你沒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所以你不知道。我們這個時代是沒有選擇的時代，就這麼簡單。你說它壓抑、專制，我覺得都不貼切，我覺得最貼切的就是「你沒有選擇」。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家都是紅衛兵，只要出身沒問題，大家都是。現在好像把紅衛兵說得很神秘，不！一點都不神秘，當年只要你出身沒問題，你就是紅衛兵。然後只要是學生，就都下鄉，你沒得選擇，也沒想到過可以選擇，你也絕不會選擇。

那麼，我為什麼會研究這個題目呢？

## 一·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四年在東北師範大學（長春）歷史系攻讀世界世紀史碩士學位。那時候開始接觸到性研究。後來到了一九九四年我曾經寫文章回憶過這段歷史，特此摘錄如下：

我出生在一個高級幹部的家庭，但是九歲時父親就倒楣而且被發配了，直到我三十歲才平反離休。所以我並非高幹子弟，那個圈子也絕不認我。十五歲到三十五歲，我平均三年左

右就換一個居住地，所以只能說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當過紅衛兵、狗崽子、農場工人、大集體鑄鋅工、工農兵中專生和機關小職員，所以哪個階層也不像，私下裡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於「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對什麼叫「無性文化」頗有些感受。下鄉等於白下，並沒有真正瞭解農民，也沒有增加任何異性交往的知識和經驗，只是記住了一些東北和內蒙農村的口頭性文學。有一次聽一個不太老的老頭唱「十八摸」，大概學生氣的反應太明顯了，老頭似乎自言自語地說：過去的人太窮了，娶不起媳婦，只好這麼唱唱，快活快活嘴。後來我覺得，這才是我的性學第一課。

一九七五年以後有幸接觸了「社會棄民」，包括賣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當時兩塊錢一次的賣淫和解放後始終沒斷過的工礦區「買雞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現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復燃」或「貪圖享受」這一類關於暗娼的人造神話。而且，當時沒人聽說過「西方性解放」。

這種經歷，在那一代人裡，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覺得生活經歷跟日後研究性學，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壓抑只能產生躁動和盲動，追求知識只能由知識來啟動。

一九八一年，我在女兒八個月時，以同等學歷考上了東北師大歷史系的研究員並最終獲得碩士學位。研究什麼？世界中世紀史。為什麼？因為我在自學歷史時（那時還挺時髦），覺得只有這一段最糊塗。

上研究生是一種資格，看書和拜師的資格。導師不經意的一句話一直是我的座右銘：「一個人一輩子能幹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該抓緊幹，至少把我佔據的這點時空染上自己的顏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該期望過高，挨罵或無成果是必然的。

學世界古代史要從原始時期學起，東北師大又保存了一大批五〇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紮進書庫，馬上就迎頭碰上許多記載原始性風俗與性文化的英文書。第一本看的是什麼？已記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書是德國人弗林格爾一九二一年寫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爾在性學史上沒有多大地位，在人類學史上的作用，我也還沒有考證過。但當年把我「震住」的，並不是他的議論，而是他所記載的、我這個中國已婚男人別說知道，就是做夢也夢不出來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類性行為。例如，直到寫此文之時，我也不能不對爪哇男子在自己陰莖上穿六個窟窿，再插上六根小木棍，以示其美感到強烈的好奇：不能不驚訝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親居然會用嘴含著青春期兒子的陰莖，以使他平靜下來；不能不想像南美母親在破身儀式上掏出並吃掉女兒的處女膜時，該是怎樣一種情景。

當年的震驚，現在很難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詞，甚至有好多多次增刪一個字母再查查字典，因為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錯了或者書上印錯了。再早下鄉的時候，有一個男知青姓焦。別人常故意問他：你貴姓？他總是回答：姓焦。別人就偷笑。直到後來全連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時，我才明白，原來是「性交」！（現在想起來，還為焦某繁心疼。）這就是那時我的性知識基礎，怎麼經得起上述「性描寫」的狂轟濫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寫第一本書時用過和沒用過的資料卡片一共有五千一百多張，全都是讀研究生時抄錄下來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見我兜裡裝滿卡片的筆記本塑膠皮兒，以為是錢，連試四次終於偷走。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對別人進行「性教育」吧，但願他看不懂。

後來又查到一套三十卷的《東方聖書》。除了神奇的印度經典（例如《卡馬經》，又譯做《愛經》，我就是在這套書中第一次讀到），我發現居然還有中國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規。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房中術」的皮毛。但當時既不瞭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還有房中術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難返譯成準確的中文原文，因此當時並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

表兄留學牛津，寄回來國外博物館裡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影本，我才開始真正瞭解房中術和中國古代性文化。說來有趣，當時海關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討論一下進口郵檢中如何掌握尺度。剛談兩次，表兄的郵件便被檢查出來了。科長哈哈一笑，予以放行。但此後再不為例，還打電話來解釋：即使寄給你，也不行。換了我也會這樣做的。<sup>1</sup>

一九八五年，那時候工作還是組織分配的，當時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到國務院宗教局，因為我們研究中世紀基督教，他說你可以做一個管理基督教的幹部。我想了想，覺得對這個實在是不太感興趣，當然我很佩服基督教的推理，我看了一些原始經典，幸虧我當時三十歲了，要是我二十歲，我一定會信基督教的，這個推理實在是太厲害了。可是我就沒去宗教局，就到了人民大學，當時也沒什麼想法，總之到了人民大學，正好趕上當時我在歷史系，系主任號召年輕老師開新課，我當時初出茅廬，不知道學術界規矩，不知道主任是什麼想法，因為我教世界史，我就傻呼呼地報了一個新課，叫做「外國性觀念發展史」。這個主任我估計他也沒太看明白，說這課能開，就給批准了。開了以後，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機關槍一掃，我這個課程應該也被槍斃，可是又趕上了偶然的因素，我們系主任當校長了。他是個老共產黨，六四以後他當了正校長，第一把手，別人就不好辦了。別人說這是當初校長批准開的課，誰敢反對？中國官本位，任何一個現任領導絕對不會推翻上一任領導的任何決定，這是鐵律，所以我就這麼堅持下來了。

1 《傳記文學》一九九四年五月。

在場的李銀河教授在北大三次申請開課，都不被批准，那怎麼人民大學批准了呢？其實人民大學是個小大學，它在中國是第二黨校，有個中央黨校，我們實際上是第二黨校，是培養行政幹部的，就是那些當不了部長、當不了大官，當中等官的人，是一個非常非常保守的學校。所以大家都非常驚訝：「怎麼會在你們學校開這個課」，我說完全是因為偶然因素。這個校長一直當到了一九九八年，當了十年校長，我這個課就堅持了十年。十年以後，我們的老系主任和當時的副校長，這兩位都不同意我的政治主張，私下吃飯的時候他們都會罵我，都會說：「老潘，你小心點，都快進監獄了」，可是他們至少承認我還是做學問的，還是在做研究，所以第二位也就繼續支持了我，到一九九九年也沒有被停止。然後到了二〇〇〇年以後，局面已經改變了，已經沒有人再來追究你或者停止你開課了，所以就延續下來了。所以就我個人來說也是個偶然啦，中國記者老問：「跟你個人經歷有沒有關係？」我早年大概三十、四十幾歲的時候也覺得可能跟我個人經歷有關係，所以我也老想我早年是怎麼回事，找佛洛伊德來讀，看看我是怎麼回事。但是後來經歷多了，我們同年齡的人在文革以後都會回憶文革的那段過程，發現每個人都差不多，都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們那個時代是鐵板一塊的時代，那個時候的男孩子差不多都這樣，幾乎沒有別的樣子。所以我就越來越覺得這不是因為我個人因素，僅僅是因為我碰見了這麼一個機會，我能夠看到這些英文書，而別的人沒有看到，所以他們也不會走上這條路。

## 二一·走向「性社會學」

### 「性革命」與「性化」的話語

做了這個方面的題目以後，我開始走向社會學，在學術界裡建構了兩個宏大的話語，一個是「性革命」。這不是中文，是從英文抄過來的，不是中國的本土概念，但是用在中國很貼切，或者是很能夠說服別人，所以現在在學界已經有些人承認。當然在社會上還沒有，國家或政府機關從來也不承認，中國有叫做「婦女聯合會」還專門接見記者來反駁性革命。其實「革命」在我的書裡面的定義，就是短時間內發生巨大的變化，就是「巨變」，對應於改良、進步、發展。緩慢的進步就叫「進步」，劇烈的變化就叫「性革命」。主要的根據就是在座的阮芳賦教授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性知識手冊》，我把它訂在一九八五年，因為在文化的表層上，在大家能夠看到的層面上，「性」出現了。你在生活中當然從來都有，但在文化表現上，這是在文革以後第一次重新出現，因此我把它畫在一九八五年。大約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尤其是開始運用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之後，我日益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性的革命。在參考了歐洲一九二〇年代和美國一九六〇年代的性革命的文獻之後，我逐步明確了自己的想法，把中國的性革命總結為：生殖革命（獨生子女政策的嚴厲推行）、性表現的革命（情色日益公開化）、性關係的革命（各種非主流現象）、性行為的革命（性生活豐富化）與社會性別的革命（性別

多元化)。

從二〇〇〇年起，在連續主持三次全國隨機抽樣的性調查之後，我覺得中國人的性已經出現了質變，所以我就又自己引了一個英文的詞：「性化」Sexualization，把它作為中國性革命の後續發展。我給出的定義是：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地被與性聯繫起來，日益成為一種很少遭到反對的社會時尚。生活中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我在學校裡上課，每一屆的本科生都是小孩，一年一年的覺得他們變得越來越厲害，現在的本科生基本上是一種非情感生物，也是非政治生物，他們什麼都不關心，他們什麼都不感興趣，他們什麼都不想聽，變化非常大。我就說性革命的那種激風暴雨、巨大變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已經完成了、結束了，現在是緩慢發展的階段。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越來越多被跟「性」聯繫在一起了，我用的是被動語態，是「被」跟「性」聯繫在一起，大概不是哪個人想這樣，而是這個社會的趨勢越來越多聯繫起來。在大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車模，展覽高檔汽車的時候弄一些女模特兒站在那兒，原來是半裸體，上個月已經全裸體了，這就屬於比較典型的例子。汽車本來跟女人沒關係，跟性也沒關係，你弄一個裸體模特兒站在那裡，我就不明白它的商業道理，你是讓我看車還是看人呢？我看人就不買車了。我到現在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把本來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情給扯到一起，尤其是利用女性。這個我倒同意女權主義的那種理論，完全是利用女性的裸體形象來完成經濟收入，這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特徵。另外一個特徵我就不能詳細講，大陸各種各樣的葷笑話

、輩段子，把各種各樣的政治事件、人物事件等等通通都扯到性方面，尤其在網路上。現在每當有孩子跟我說「菊花」的時候，我都一顫，這個事怎麼會這麼多中國人都知道了？我覺得變化實在是太快了，動不動就「爆菊」，對我們這代人來說，變動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我就建構了這麼兩個話語，「性革命」和「性化」。當然是從英文抄過來的，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我們中國大陸，想要自己提出一種獨創性的基礎理論，目前還不可能，大概幾十年之內也不大可能，但是我們可以對西方理論作出重大的修正。大陸跟臺灣不知道有沒有可比性，它有個三國演義，一方面政府是最強的一面，共產黨是最強的，人人都知道，他們是曹操；另外一批人是自由主義者，他們是劉備，他們跟曹操鬥；至於我們這幫邊緣派，就是孫權。我們這個位置很尷尬，我們一方面不願意全盤接受西方理論，可是你稍微提出質疑，馬上就被政府利用。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我能夠在中國的頂級刊物一個叫《中國社會科學》一個叫《社會研究》連續發表六篇論文，所有人都很驚訝：「你這個破題目怎麼會發表在這兒？」我自己後來才琢磨明白了，就是因為我的論文置疑了一些西方理論，在共產黨看來，「你就是反西方，好！你是主張中國獨特論，好！所以就發表！」我就很尷尬，好像我怎麼老成了幫兇，這絕不意味著學界主流承認性研究，或者承認性革命什麼的，僅僅是因為你有置疑西方的成分在裡面。在這方面，我們人民大學性社會學所更多的從本土出發來置疑西方理論，但是獨創性的基礎理論貢獻我個人估計還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哲學基礎太差，大家都知道從古到今

哲學基礎都太差。

這樣的總結，其實沒有多少可以引經據典的學術依據，主要來自我個人對於中國社會的體驗與感悟。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已經三十歲了，整個青少年時期完全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三十年來性的變化之劇烈。它已經超出了我年輕時候的任何夢想。我當然歡迎這個劇變，因此把它命名為性革命。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我越來越多地看到了一些我不那麼喜歡的變化，也在調查中知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困惑或者反感，這促使我使用「性化」的概念而且認定：性的精神禁慾主義已然逝去，性的時尚則是這一代年輕人的主要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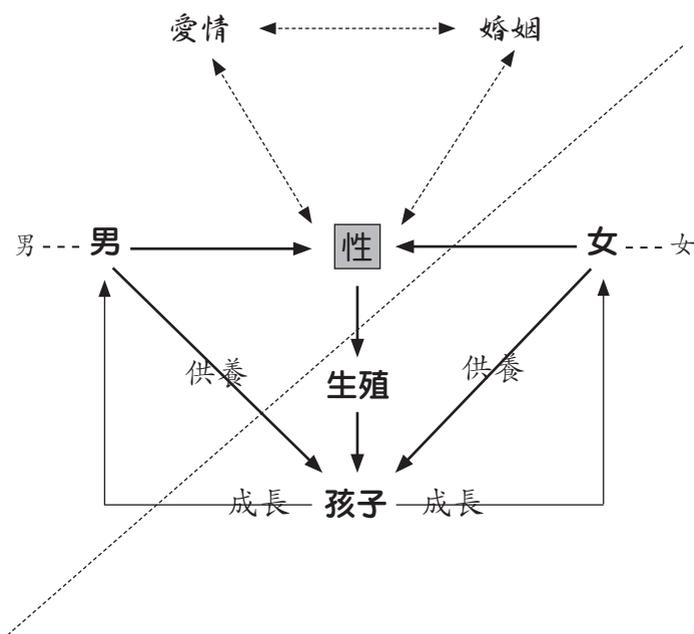
## 「初級生活圈」的分析框架

我是我家五個子女中的老三，但也是第一批獨生子女的父親。對照我終生碌碌的母親與我堅持到下崗的妻子，痛切感到生殖革命對於女人和男人的巨大作用。

我在一九九五年首次發表了「初級生活圈」的分析框架，主要借鑒了西方的「供養制理論」，也就是男人和女人通過「性」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性，尤其是沒有女性的進化，男人跟女人根本不需要走在一起，男人可以手淫一輩子，女人也可以手淫一輩子，兩者根本互不需要，人類也根本不會有後代，根本不會活到一起。是因為女性的進化，人類女性跟動物界的三大進化，促使人類結成了這樣的男女關係，或者說，女性用自己變化了的身體和功能吸引男性或

者迫使男性不得和女性結成一個長期的關係，否則沒有人類、沒有今天。我們後代沒有一個能長活，因為我們延續了生物界最愚蠢的一條進化道路，第一，我們直立行走，我們浪費能量，直立行走消耗多少能量？我們跑不快也抓不住兔子，我們一隻兔子也抓不住。其次，我們還要去做愛，還有性高潮，浪費很多的能量，別的動物都是只要交配就可以繁衍後代了。第三，我們生得少，生的個兒大，長的慢，孩子要到十歲左右才能參加勞動，十年！這都是最愚蠢的進化道路，人類早該滅絕。但是為什麼活到

### 初級生活圈的示意圖



今天？第一，學會了思考，第二，學會了勞動，第三，學會了做愛。沒有做愛，沒有今天，所以我們才活到了今天。

這樣的一個基本框架建構起來，中心意思是什麼？又是從我們中國現實出發，那就是在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性」。你叫 sex 也好，叫 sexual 也好，中國古漢語大家都知道，性絲毫跟男女關係沒有關係，從來是「性質」的意思。阮芳賦教授考證，日本人先把它翻譯成「性」，然後傳到中國，變成「性」，我們中國跟它最接近的兩個詞，一個是「情」、一個是「色」，只有這兩個詞接近於現在「性」的意思。這說明什麼？在中國儒家兩千年的社會裡面，性壓根就沒有獨立過，我們現在研究的一切都是一九一九年或者至少是民國一百年以來中國才出現的現象，在此之前沒有這個玩意兒。性交是有的，生孩子是有的，但是文化中沒有這個概念，從來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事情，可以把它分出來。所以我們這個「初級生活圈」就是提醒中國人，你要結合好幾方面來看性的事情。在這個圖裡，男旁邊畫個男、女旁邊畫個女，就顯示中國同性戀之所以受到歧視，它不是光明正大的或者不是主流，就是因為違背了初級生活圈所要求的。因為男人跟男人不能生孩子，那後代怎麼辦？這個初級生活圈就沒有辦法維持了。在這樣的思考下，同性戀承受很殘酷的壓迫倒說不上，但是它就不太可能成為主流。

這個「初級生活圈」不但能解釋當年的中國，也尤其能解釋一九八〇年以來的中國。為什麼一九八五年之後發生了性革命？我認為就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人

，很難理解這一點，到二〇一〇年，中國的獨生子女在城市中十四到十七歲的總人口中已經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他們沒有哥哥姐姐，將來長大之後，什麼「姨姨」、「舅舅」這些中國字都沒有用了。獨生子女政策給我們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解放了婦女，她們一生只懷孕一次、生育一次，加上半次人工流產，一點五次，剩下才有時間、精力來從事性活動。以往不是道德約束女性，而是女性完全都沒有亂搞的可能性。我們有個聰明的大陸女人叫木子美，二十八歲未婚，你都只注意到她的思想觀念，卻沒有注意到，她二十八歲了！就在五十年前，她至少會有四個孩子了，帶著四個孩子，哪有時問精力性自由？還沒跟人上床，這個哭，那個鬧，這個拉屎，那個撒尿，絕無可能亂搞。所以獨生子女政策一下子至少給城市婦女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後來婦女能受教育都跟這個有直接的關係。你從西方理念來說，中國婦女沒有生育選擇權都是政府強迫的，可是客觀上的結果是，它給了婦女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別的活動中。

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影響的就是避孕流產的合法，不但合法，還強制推行。大家都知道在美國，人工流產這個事吵得一塌糊塗，鬧得天翻地覆，可是在我們中國，一年都用不到就順順利利的施行了，人工流產到現在還是強迫性的，不流還不行。美國可以有百萬的少女母親，可是在中國，老實說，連一萬都不可能，幾千個我相信，但超過一萬我絕不相信。有計生委，妳結了婚想生，都得領證，領證還有精確的月份。這個在其他社會中都是無法理解的。人工和避孕流產的合法還帶來什麼呢？帶來我們性關係的開放。在傳統社會，你想當場抓獲一男一女，

婚前也好或婚外通姦，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農村社會裡，兩個人往高粱地裡一鑽，別說你們居民，日本鬼子大掃蕩也抓不出來！不可能發現的。那怎麼發現的？就是私生子女，因為不會避孕、不會流產，懷孕率相當高。男人當兵三年，回家一看，多了個孩子，或者你們家生了個孩子，大家一看，長的跟村長一個樣，馬上就敗露。

所以中國兩千年來沒有一個婦女講「解放」，不是道德上不行，而是客觀上就不敢，因為妳就沒有任何可能性去做這樣的事，一下子就會敗露，太容易了。一直到獨生子女政策帶動合法流產，我們中國現在才能帶來性革命。所有的西方白面孔記者都會問我：「這個革命跟美國有什麼關係？這跟人權有什麼關係？」我覺得你現在說，可能是有關係啦，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們根本不知道還有人權，這兩字都沒見過。性革命真正內在的原因就是因為獨生子女，現在計生委（計劃生育委員會），很大的一個委員會，全國有幾十萬人，他們最反感我說這個；我說我一點也沒罵你們，當時一九八〇年的中國人想不到，現在的中國人要是我不說，他們也想不到。學歷史的人說，這是歷史的一個產物、一個結果，當時誰能想到？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我也沒想到。我大概在九十年代總結初級生活圈的時候才總結出來這個想法，我覺得初級生活圈這個小小的架構在分析中國的問題時會比較貼切，就是在那個三角結構中，要是把生殖這一塊給切斷了，相對分離以後，那這個三角結構就不穩定了；不穩定之後，男女關係也不穩定了，同性戀也出現了。把這個初級生活圈破壞了，革命當然就會到來。

### 三·從統計學走向「論方法」

#### 問卷調查的崇拜與反思

我這些年做的研究越來越注意方法論的問題。我原來是學歷史的，也不是學社會學的，一九八七年才轉到社會學系。我當時想，歷史畢竟還是想說明現實，那我不如直接研究現實，所以就轉到社會學系了。我沒有受過社會學的科班訓練，所以那時候就比較直觀的想要開始做調查，一九八六年還沒到社會學系的時候我就做了一個六百多人的調查，現在想起來是完全失敗的，因為根本不懂得一些基本的技巧等等，但是已經開始做了，慢慢的在問卷調查這段路上越來越走，也當然越來越接受西方的那套東西。統計學也是一九九〇年前後我的一個學統計學的同事一點一滴教我，因為六四以後我們什麼也幹不了，就每天蹲在機房裡面，他教了我一些統計學的基礎。二〇〇〇年我跟美國芝加哥大學合作做了中國第一次的總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社會學很講求這個，隨機抽樣對總人口很有代表性，別的學界不太注意這個。一九九二年劉達臨教授在中國做了第一次性調查，有兩萬多個的樣本，但是跟我那個調查是不一樣的，因為我的調查不在於人數，在於隨機抽樣。這個調查做完以後，二〇〇六年我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又做了一次，然後去年二〇一〇年再做了一次，基本問卷都是相同的，只是越加越長，調查的樣本也就越來越多，都是在全國一〇三個縣下面一共一百九十五個村或者居委會做的調查

，我們用筆記本電腦來調查，這也是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方法，太學術化的細節我就不講了。一九九四年我的回憶錄是這樣寫這段的：

一九八六年我就開始做性方面的社會調查，因為我覺得，研究性的歷史最終還是為瞭解釋性的現在，還不如直接去瞭解現狀。另外，我那時已經看了許許多多關於性的抽象思辨和議論，不免產生疑問：這些議論的依據何在？與其我們互相瞎吵一頓，還不如首先調查一下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究竟在幹些什麼。

第一次調查六百〇三人，都是聽過我講性學課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學員和幹部專修班的學員。那時我對電腦和統計學一竅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來，後來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一九九一年時最終能夠獨立處理和分析調查資料。

第二次是一九八九年初，譚深帶領我和史希來、周孝正去上海，調查了參觀《人體油畫大展》的十九萬上海觀眾。

以後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對二十七個城市一千二百七十九人的調查，對北京市區九百七十七人的調查、對全北京所有大學生的抽樣調查、對一百六十五名男子同性戀者的調查、運用《金西（金賽）報告》中的問卷對中國讀者的調查、對南方三個城市非婚性行為的調查。

觀察也是一種調查。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每個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園裡，測定當眾公開親暱的異性伴侶的親密程度和他們當時所處的場景，最後總結為一個數量化的親昵行為與場景的相互關係模式。這個報告在國外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直到今天，我的調查報告都是在國外用英文發表的。

但是調查來調查去，我逐漸發現，目前中國的性學研究雖然也很缺乏調查，但更缺乏的

是理論，尤其是提不出較好的假設，甚至根本說不清自己想調查什麼。例如我的第一次調查，現在看來幼稚之極，把性知識水準、性觀念取向，性行為實況全都混在一起來調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們之間可能有什麼關係。結果只能算出來一些簡單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過色情錄影，有多少人用過後面進入的性交姿勢。但要命的是，這些百分比並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而且根本無法解釋人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後來好多了，調查越設計越合理與精細，許多重要的相關關係被發現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測出來了。但是在基本理論上還是進展甚微，還是無法提出好的假設。逼來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轉回去，重新思考那些當年非常誘惑我的「大問題」。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論模式。<sup>2</sup>

這些統計資料，給我個人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基礎，使我說話越來越氣粗，比較有根據。很多傳媒都說，「你這個東西應該報給國務院、報給國家」，可是中國大陸的特殊情況是，好像每一個部門都能管到性，連工商局都能管，畢竟你要性商店註冊，它就能管你，不給你註冊；可是又沒有任何一個部門來管性，所以這個報告沒有地方送，該送給誰呢？沒有這麼一個政府部門。大陸是一個比較奇怪的體制，像通姦是普通男女之間的事，公安也不管，可是誰都有權力插一腿來管你的事。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也曾經抱著希望，這些研究成果和統計資料對國家可能有點好處，尤其是愛滋病來了以後，我想對中國人的性活動的認知至少對預防愛滋病可能會有好處，可是十幾年下來，我已經完全絕望了，我根本不想做補天派，沒有辦法呀，中

國社會至少在二〇一〇年前後已經斷裂到這樣，絕大多數正直的知識分子已經跟政府絕緣了，就是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反正我也不會再為你貢獻任何力量了。包括預防愛滋病，差不多要變成一種權和錢的交易，和衛生、健康、愛滋病絲毫關係都沒有了，所以我也就退出了。也不是我退出了，是被人家開除了，不要美化自己呀。

我在問卷調查越做越多以後，最樸素的一個想法就是，我自己能相信這些資料，因為我設計的問卷，我組織的學生，而且基本上那些調查點我都去過。當然我不可能在那裡待著，我就飄來飄去，就督導嘛，每個地方都去過，那些被調查者我也都見過，個別也先聊過天，他們回答的一些情況我能相信。我們公布的資料裡面都會再三跟讀者交代清楚：這個數據只是下限，因為中國還有道德顧慮、法律顧慮。譬如嫖娼這個事，我們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八的中國男人嫖娼，所有中國男人大概都不相信怎麼會只有百分之八？至少也稍微多一點吧。我們就只好解釋：這個事目前還是犯法，最高的刑罰是五千塊錢、拘留十五天，還要通知家屬。所以這百分之八表示什麼？說明這些人還敢承認。只能說明這個。你說真的有多少人嫖過娼，社會科學沒辦法做到這一點，上帝也做不到，所以我們強調這只是下限。我們的調查裡面，同性戀者只有百分之四，我們也只得強調，在現在的環境下，有這麼多人敢承認，它的定義應該是這樣，絕不意味著一定就有這麼多人；反過來，會不會有一些誇張呢？我想也還是有的，只是我們現在沒辦法知道。

自從一九九八年去調查紅燈區以來，我對問卷調查的崇拜出現了巨大的疑問。尤其是二〇〇年、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〇年主持了全國隨機抽樣的性調查之後，在不斷的清理資料與統計分析過程中，我根本無法把那一個個的數字還原為我在調查現場所見到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由於我從一開始就是「一條龍工作」（從問卷設計到現場調查到統計分析到文章寫作），所以更加感受到問卷調查不但存在嚴重的真實性的問題，而且根本就是在剪裁生活，根本就是無奈之舉而絕對不是最佳選擇。再加上一九九八年以來，我在多次研究性產業的實踐中開始使用與論說「社區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更加關注社會學調查方法的學術探索。

越來越置疑後就不得不考慮哲學化的問題了。本來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理論思維，我也不太想這種事的，現在就不得不想了：什麼叫真實呢？或者說，我們研究者到底想要什麼呢？我們學史學史料，難道史料都信嗎？或者怎麼篩選、鑒別呢？歷史學有一套辦法，它可以做比較，我們這個調查只有我做，全中國只有三個資料，那我跟誰去對照呢？怎麼辦呢？所以不得不想這些問題，也就逐漸地走向了「定性調查」，尤其是一九九八年以後開始做紅燈區的研究，就發現做問卷根本就沒有現實可能性，總體也不知道，也不可能隨機抽樣，說做問卷，簡直是胡扯。在沒有可能性的情況下，被迫不得不用定性方法，臺灣叫「質性研究」，我們大陸年輕的學者也叫質性研究，但是我個人堅持用「定性」，因為它跟「定量」是對照的，而定性、定量這兩個中國詞非常容易懂，「質性」反而非常容易不懂。而且「質」跟「性」是同義反復，在

大陸的話語裡面覺得這個話是不通的。

## 歪打正著：社區考察的調查方法

在一九九七年裡，我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鎮、中南腹地某工業城市旁邊的開發區和湘黔交界處的某個私人雲集開採的小金礦。在《存在與荒謬》中，對於珠江三角洲B鎮的考察報告，篇幅最多。

在接下來的一九九八年裡，我決定放棄那個開發區和小金礦，集中力量研究珠江三角洲的B鎮。這是因為，在其他那兩個社區裡，「性服務」的形式比較單一，在發展階段上也比較落後，而B鎮的「性產業」則層次更多，社區的聚合程度更高，而且已經發展到市場經濟的自由僱傭制度了。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三月五日、七月十一日到二十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我三次到B鎮和它所屬的S區，進行了總計四十六天的社區調查。<sup>3</sup>

### 1. 什麼叫「社區考察」

從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所謂社區考察應該具有這樣一些特徵和規範：

- 所研究的社區，應該具有足以說明問題的、明確的時空，既包括確定不變的地理範圍，也包括足夠長的一個時間段。因此，蜻蜓點水式的多地巡遊，顯然不能算作社區考察。
- 所針對的社區，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而不僅僅是一個行政管轄區或者簡

- 單聚合的一群人。
- 從具體方法上來說，所謂社區考察應該是盡可能多地運用各種研究方法，研究的側面和層次也應該盡可能地多。

一般來說，社區考察僅適用於典型調查或者時點調查，無法代表任何一個相當大的總體。同時，從基本性質上來說，它也是定性描述，無法進行統計分析。因此，社區考察既不是至高無上，也不是百病包治。但是，由於在方法論上，它處於個案訪談與隨機抽樣調查之間的位置上，因此它也具有一些無可替代的優越性：

首先，社區考察更容易瞭解到某個人類集群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人文傳統和心理氛圍。因此，在解釋人類行為或者社會現象時，可以比個案調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環境感；可以比問卷調查獲得更多的相關因素、參考情況和縱深資料。尤其是，如果我們並不那麼追求個人故事的生動與量化資料的精確，那麼社區考察反而可以在確定的時空內，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總體，更深刻地揭示其內外縱橫關係與機制，更貼切地理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的眾多影響因素。

其次，在同一個社區考察之內，可以把定量調查與定性調查、個案與問卷、觀察與訪談、歷史資料與現實資料等等更好地結合起來，形成更為綜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對具體方法之間往往都存在著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第三，在社區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獲得對於該社區的整個生活的直接體驗、感受和理解；更容易發現那些無法量化和統計的、無法在個案中表現出來的、甚至根本無法言傳、無法觀察的活生生的資料。也許，這就是社區考察最大的優點。

## 2. 社區考察的內容

筆者在本書所講述的社區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調查與觀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 定時定點的監測（「蹲坑」）
- 挨門挨戶的粗淺訪查（「問價」）
- 直接住在某場所裡進行的摸底調查（「入住考察」）
- 從經營角度訪談老闆（「取經」）
- 以「閒人」的身份訪談小姐（聊天）
- 模仿嫖友訪談嫖客（「同行交流」）

在社區考察的過程中，筆者主要從事了四方面的工作：

### 1. 收集官方資料

筆者從各個政府部門和管理機構，收集了該鎮和各個管理區（相當於內地的村）的基本統計資料，尤其是與性產業密切相關的那些統計資料。此外，筆者還訪談了一些官方人員。

### 2. 定時定點的監測統計

筆者運用現場觀察的方法，對非法性產業的多種場所，進行了定點的時段觀察記錄以及時點觀察記錄，然後加以統計處理，以便推算性產業的實際規模，發現其活動特點，確認其活動規律。筆者觀察的重點是小姐的情況和她們可見的活動。

### 3. 個案訪談

筆者對許多性產業的當事人和直接相關人員，進行了非量化的個案訪談，對其中的重點人物，還進行了追蹤訪談、客觀觀察和搜集旁證。

#### 4. 訪談調查

顯然，這樣的個案訪談與目前所發表的大多數個案研究有所不同。筆者的研究重點並不是當事人的個人歷史或者從事這個職業的個人原因，也從來不想僅僅靠這些個案來推斷性產業得以產生與發展的原因。筆者只是試圖是通過這些當事人，這些直接就業者和親身體驗者，從內部來瞭解和分析整個性產業的狀況。這樣一個研究角度，是這次社區考察中的個案訪談的靈魂與最重要價值所在。

筆者對當地居民（包括流動人口）中的各個不同階層分別進行了訪談調查。訪談的主要內容是：

- 瞭解整個社區的綜合情況；
- 從局外人的角度上，瞭解當地性產業的發展史和現狀；
- 瞭解當地一般公眾，尤其是婦女，對於性產業的認識、評價和可能做出的選擇；
- 瞭解性產業與整個社區之間存在著何種關係與相互作用；
- 社區內的分層。

筆者的基本假設是：在一個社區裡，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動人口）都可以根據他們與性產業的關係，劃分成五個階層：

- 性產業的直接從業者；
- 客觀上從性產業的存在中獲得好處的人；
- 與性產業毫無瓜葛的一般公眾；
- 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產業損害的非直接從業者；
- 作為集體和制度的各種官方人員（當他們作為個體存在時，則可以歸入前四個階層）。

不同的階層在看待和評價性產業的時候，由於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擁有不同

的價值觀和參照系。

### 3. 考察側重點

首先，考察不同階層對性產業的不同態度，分析他們各自的態度對性產業發揮了何種作用。

其次，分析不同階層的不同態度之間，存在著哪些差異、矛盾甚至衝突，以便深入理解整個社區在性產業這個問題上，究竟是如何構成以及運行的。

第三，針對同一個問題或者同一個現象，對照比較和互相檢驗不同階層的不同說法，以便盡可能地接近客觀的真實。

尤其是，在五個階層中，第一個（性產業的直接從業者）所描述的性產業的情況，與第五個（集體的官方人員）所描述的，簡直有天壤之別。因此，筆者極其重視對於一般公眾的訪談調查。這是因為，在五個階層中，一般公眾這樣一個群體處於中間的位置之上。訪談他們所獲得的資料，可以用來核實與檢驗那些從社區管理機構獲得的各種統計資料；同時也就對性產業參與者的主訴中的有關方面，進行了測謊。

從事後的系統分析結果來看，上述對於研究對象和考察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研究者能夠獲得足夠的、全面的、更加真實的資料，證明這些設計是成功的。<sup>4</sup>

做紅燈區研究，從一開始到今天，我這個老思路，八十年代受教育的，沒辦法改變了，仍然是沿著宏大敘事的思路走的，經常是想解決性產業的現象或者這些群體的社會學研究，仍然

4 《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

是想從這兒出發，結果也得出些結論。這些結論除了我自己出版的書之外，碰巧地也借了一個愛滋病的話題在一個文章裡面被發表在中國的一個頂級刊物。中國官僚體制很嚴格的，只要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一篇文章，你就可以聘教授，這個是鐵板的，當然權力在裡面就非常的濃厚了。當時藉著愛滋病的一篇文章，把它說出去了，我覺得也就行了。我們這個學歷史的跟大家可能有點不太一樣，我們活著是為歷史活著，絕不為現實，將來哪天有個研究歷史的人找到這篇文章，看到這段話，就行了。八〇年代初的時候，我個人的導師教育我說，那時候報紙上登了一篇文章：美國的英文科技論文，平均只有七個讀者，一個是作者，一個是編輯，所以在八〇年代的時候，就只有五個人讀你的論文。我想到了二〇一一年，大概只有二點一個，除了你還有編輯，還有零點一其他的讀者，大概是這樣。

## 主體建構視角的提出

在同時進行全國問卷調查與性產業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在黃盈盈博士的合作下，我終於在二〇〇七年發表了〈「主體建構」：性社會學研究視角的革命及本土發展空間〉一文。

按照作者的理解，這種「性的主體建構視角」可以初步表述為如下兩個方面：

建構的視角反對把「性」視為「天然的靜態存在」，強調對於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和解構，尤其重視社會、文化、政治、歷史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建構的基礎、動機和意義；第二層次，建構的過程和方向；第三層次，建

構的機制及其所蘊含的權力關係。

「主體」的視角反對研究的客觀化，主張從「主體」出發。它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強——調被研究個體的「主體性」和體驗性；其次，在自己的文化中，側重的是個體之間的互為主體的機制；第三，在多文化中，我們所處的文化就是一個主體。

「主體建構」視角可以說是這兩個方面、三個層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總體。儘管這一學派其實很反對把自己「定義化」，但是作者還是可以把主體建構視角集中表述為：把現象作為主體自己建構的結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僅僅環境決定的），以主體的感受和體驗（而不是研究者的認知）為基礎，更加側重去研究主體自己的建構過程（而不僅僅是建構結果及其作用）的諸方面。<sup>5</sup>

## 「論方法」的完成

在進行二十年的問卷調查與十年的定性研究之後，二〇〇六年上半年強加給我一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國家重大課題，使我獲得了一個「計畫外」的機會，到現在終於出版了專著《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昇華》<sup>6</sup>。

我以為，除了性社會學之外，這可能是我足以留給學生們的最佳遺產了。

## 四· 現場調查中的倫理衝突

5 《社會學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三期。

6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九月。

我講個故事，這是個可以宏觀的故事。我們來到四川，在四川的成都南面的地區發現了前後八個縣都有紅燈區，可是這八個縣的紅燈區不知道為什麼都在經濟開發區。所謂經濟開發區，就是政府畫定一個鄉的土地，然後說這要建設經濟開發區，把土地平了以後修一條大馬路，然後就完了，不管了，號召當地農民把儲蓄都拿出來在旁邊蓋房子，公路兩邊蓋的房子都是老百姓自己蓋的，然後就招商，希望外國投資者到這來建工廠、建商業區等等。可是那幾個縣都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毛之地，根本沒有任何發展工業的可能性，所以建起來一年以後，根本沒有人來投資。當地老百姓怎麼辦？只剩一條路：辦紅燈區，辦性產業。這樣，遠自成都的會開一個小時的車來這嫖娼，為什麼？因為安全，這沒員警，員警不抓，所以就成了紅燈區。

農民根本不想辦紅燈區，但是因為他已經沒有土地了，也沒有儲蓄了，他已經不可能再變成農民了，那他只好開紅燈區，再來就開賭場，可是開賭場的條件就不如城裡，所以賭場競爭不過城裡，只有紅燈區。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寫的一篇文章問：「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在中國存在？」我想說：紅燈區為什麼能在中國存在，這就是歪打正著。中國很多社會現象，絕不是因為有人想這樣做，它的一開始是因為盲目決策，在鄉一級搞開發區，是這種決策最後產生了紅燈區。這些性產業對我們這些小姐，造成了什麼結果？第一批小姐都是在別處做過，被他們招來的，招來後一看，一天都用不了，半天就明白了，這裡沒生意，所以就跑了。那怎麼辦？只好拐賣、誘騙，這些醜惡現象都會發生，把那些女孩子騙來，強迫她們做。

可是她們一旦成為小姐，也馬上明白的，這兒沒生意，她也會跑。所以當地人就總結：我們這是全國小姐的培訓基地。但是我們研究者又要如何面對小姐呢？

我剛開始考察紅燈區的時候，最初遇到的道德問題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後來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一個根本道義上的問題：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那些小姐和媽咪呢？

這裡面又有3個層次：

第一，我究竟應該不應該去研究她們，這本身就是一個道義問題。

在西方激進女權主義者中，有些人認為，任何對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們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給她們帶來損害。如果真的是關心她們，就請收起憐憫和託辭，去幫她們建立一個工會。

我不能否認，像我這樣大談性產業和紅燈區的情況，有可能使得小姐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實只是像小草那樣不顯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時候，過度的關注就可能像過度的鎮壓一樣，危害到她們的現實生活的品質。

可是，我是凡人。雖然我並不認為研究小姐就一定會損害她們，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亂墜地打扮自己，因為這個紅燈區裡的老闆「左總」（見第三章），已經一語道破：「你是教授，總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並不可怕我摸他的底。）

不過，我仍然承擔著道義上的責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國人的兩條古訓：在精神上堅持「將心比心」；在行動上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體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諮詢當中一樣，努力去真地忘記所有人的真實姓名，因為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這樣可以減少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小姐可能造成的傷害。

其次，我努力「學術化」，寄希望於大多數各級決策者都不會看我的書，看了也會無動於衷，惹惱了也只來處罰我一個人。這樣，也許可以在整體上避免危害小姐們。

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仍然會使我居高臨下。還是嚴月蓮女士說得更加透徹：怎樣才能真正平等地對待小姐呢？只有四個字，就是「自甘墮落」，就是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裡裡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否則，請離小姐遠一點，讓她們過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義的第二個層次是：我能不能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對方所不願意暴露的隱私呢？

例如：萍姐（媽咪02）已經回家鄉結婚了。這是研究小姐「轉業」和「退役」的罕見好機會。可是，我還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嗎？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還能表示我們曾相識嗎？顯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記錄極不完整也罷。

再如，我曾經偶然遇到過一位現在已經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這是研究小姐的「業內上升」的絕好個案。可是，既然她並沒有主動跟我打招呼，那麼我就只能視而不見，擦肩而過。

我堅信，任何社會調查都不能搞「逼供、誘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溫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對方的「隱私屏障」，就是尊重對方的整個人格，也就是尊重調查者自己。<sup>7</sup>

7 在《社會學概論新修》的第九章裏，我專門論述過調查中的「隱私屏障」的問題。作為本科生使用的國家級重點教材，這本書已經發行了十四萬冊。我欣喜地發現，在歷年的研究生考試中，大多數考生都能夠充分地強調我在該書中所提倡的原則：「如果不能化解被調查者的隱私屏障，就應該無條件地尊重它。」

第三個層次是：我應該從什麼角度上去幫助她們呢？

在西方，從十九世紀起，就一直有許多善良的人們試圖「拯救」妓女，哪怕僅僅拯救她們的靈魂也好（勸她們入教）。現在，中國的許多機構也在大張旗鼓地拯救「失足婦女」，甚至關押她們的地方的名字，也與關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樣，不叫「勞教所」，更不叫「監獄」，而是叫做「婦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們的這一切良苦用心，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須「抗拒從嚴」。馬玉珍，一個北京的媽咪，不就在春天即將來到一九九九年時候被槍斃了嗎？也許我應該虔誠地相信：她的罪惡已經等於真的殺人了，已經大於那些貪汙受賄上千萬元和鯨吞公款近兩億元的人了。

可惜，我所見到過的所有小姐和媽咪，雖然都表示自己願意變出性產業（轉業或者退役），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有什麼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沒有一個認為自己現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什麼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們認為那僅僅是「被抓」，是「勞改」，是自己從事這個職業所不得不面臨的諸多災難之一。結果，按照通行的說法，她們也就自絕於所有那些準備教育她們的機構，自絕於主流文化。

可是，她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底層、最弱者、最無望的人。她們確實需要幫助，需要一些對她們自己有用的具體幫助。

這樣一來，我就很難辦了。雖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們，因為我沒有領那份工資，也沒有人給我授權。但是我是一個人，又領受了「抗洪精神」<sup>8</sup>，理應奉獻愛心。可是我仍然沒有做多少。因為我的活思想剛剛冒頭，「左總」就藉著議論一個嫖客的機會，洞若觀火般地說：「你給多少錢都沒有用，都給（她們的）雞頭拿去了。」

當然，原因也不是這樣簡單。我從小就知道「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我還看過不下六次電影《大浪淘沙》。在那裡面，主人公想給一個乞丐一些錢。一位地下黨員教導他說：天下的乞丐那麼多，你一個人能管得過來嗎？只有推翻萬惡的舊社會，所有人才都能幸福（大意）。於是主人公就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說，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成功地使用了「為了整體的長遠利益」這樣一個信仰，使得他們最初發源於深切人道同情的個人義舉，成為偉大的事業，並且最終成功。筆者屬於「老三屆」，就這個問題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儲備中，這是唯一可供選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論。所以，三十五年之後，我在S區面對乞丐般窮困的小姐時，這就成了我不施捨的理由。

不過，最近十五年來，我又總是被教導應該「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所以我也總是在懷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當救世主，再做人上人」？這搞得我著實困惑了好多天。

最終，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夾縫是：盡可能多地給她們講一些預防性病的知識、給幾個人一些不要吸毒的忠告、幫幾個人辦一些與她們的業務無關的事情、資助一個人回家。

此外，我也許是老糊塗了，所以還盡可能多地陪她們呆坐、打撲克、逛街、吃飯，哪怕這些對我的研究毫無意義也罷。因為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她們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測的枯燥、乏味與寂寞；還因為她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說過，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和「外人」這樣對待過她們呢。結果，有一次下雨時我要出門，在場的四位小姐一齊幫我到處找傘，令我十分感動；因為她們自己沒有傘，也從來不用傘。

當然，我知道，這一切肯——定會被一些人斥罵為「物以類聚」。可是，如果我們這個

社會，連將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責，那我們還活個什麼味道呢？

## 五·專業知識分子與犬儒主義

到了現在二〇一一年，我卻發現自己在心態上確實變成了一個「儒家」。在社會實踐層出不窮、多元思潮風起雲湧的今日，我還一直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畝三分地」。這究竟是專業知識分子的操守，還是犬儒主義的生存？我自己也沒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釋：我一輩子走到現在，已經沒有參與社會的能力與資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終了。

文章該結束了。我希望讀者們對性學這門學科感興趣，而不僅僅是對我這個人感興趣。但是這是《傳記文學》，我也該有一些起碼的交待。不過，可都是自我感覺啊。

我的外表年齡比實際年齡至少大十五歲。這對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兩種職業是越老越受人歡迎，一是醫生二是教師。我不是醫生，但是總有些朋友來找我，幫他們解決一些隱私問題，所以也算跟「醫心者」沾邊。我常做調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輕的覺得可信賴，年老的覺得有共同語言，女同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寧可獨處，不喜歡聚，因此得罪過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好的調查專家。除了調查任務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呆在家裡看書、寫東西和想。過去一直住在父母家，只有十點五平方米的一間屋，一九九三年春節才分到兩居室的住房。

我和妻子是毛主席做的大媒，即「文革」中因下鄉而相識相愛。她是鄉鎮的店員之女，我從她和她家獲得了許多鄉鎮生活的知識。她現在是會計，自從我上研究生開始，她掙的錢就一直比我多。她並不想搞學問，但她始終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經事和好事。直到今天她也沒有逼我下海撈錢，而我的兩位很有前途的小師弟，恐怕都要因後院起火而事業夭折了。

我們趕上了獨生子女政策。女兒一出生就拿了一百元獨生子女獎金。現在她到青春期了，也讓我懂得了不少現在青少年的心理與風氣。她長大後會有自己的事業選擇，八成是反叛我，我早下定決心，絕不干涉。

現在（一九九四年——補注），即使按最寬鬆的標準，我也是人到中年了，自己鮮明地覺察到心態的老化。有一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法國博士曾對我說：「現在你可能是最激進的，但到五十歲時，你會變成一個儒家。」中外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氣，不願辜負當年把我引向性學的那種激情。我會一直告誡自己的。當然，如果劇變的歷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拋棄了我，我會欣慰的。

從否定傳統開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這就是研究者的「命」。<sup>10</sup>

最後，我想說一點，我們現在的處境在中國，尤其是最近十年來，各種各樣的草根組織、NGO 風起雲湧，各種各樣的運動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非常的尷尬。很多年輕人當著我的面罵：「你們就會自娛自樂」，我想我要是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也是會這麼罵別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個研究，如果不是自娛自樂，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堅持不到，所以我們最大的尷尬

就是，面對中國這麼大一個我們聽臺灣說叫「威權」，最近半年來抓了好幾百個人，十個可能蹲到監獄裡面的這種環境下，我們這幫做學問的教授該怎麼辦呢？我也沒有什麼好的結論和想



二〇〇四年五月香港五一遊行  
上圖：潘綏銘（左一）與各國性工作者合影  
下圖：潘綏銘在遊行中高歌一曲「國際歌」

圖片來源／何春蕤

法，我只好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專業知識分子」，專業知識分子在別的國家叫「技術官僚」，很保守的，很多國際上的人都在罵，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都是犬儒主義的，就是縮頭烏龜，我不知道，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我現在跟吳敏倫教授的定位稍微有一點類似，我跟所有草根組織的關係就是：你如果需要學術包裝，我來給你包裝，你想在哪個雜誌上發表，我把你變成主流的八股，你就能發表。但是我只能幫你們這麼一點點，別的我也做不到。謝謝各位。

## 問題與討論

卡維波（主持人）：我想應該要沉澱個幾秒鐘來想想怎麼講，感覺上最後好像沒能让你暢所欲言。

潘綏銘：喔不，已經很難得了，已經坦白交代了。

卡維波（主持人）：我看你寫的東西有你家庭、個人的一些事，有個人的，但是也有社會時代的，也對你個人的學問有一些分析，真的是坦白交代了。我相信每個人都學到很多，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立即的問題想要馬上問的，那我們就請大家隨便問。

與會者：想要請問教授們，關於做科學研究通常是否會先分類？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一個女生坐沒坐樣、站沒站樣有問題，男生就沒關係，是這樣嗎？

潘綏銘：這個我還真想回答一下，這也是我這幾年想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把它叫做「光

譜」。人人都知道光譜，但是光譜本身就是一個分類，因為它之外還有紅外線和紫外線，紅外線紫外線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人眼看不見，我們只能看見這個光譜。所以做研究首先就得面對這個問題，你只研究這個光譜，難道對嗎？應該不應該包括紅外線和紫外線呢？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你在光譜裡面，人人都可以看出來這大概是綠、那大概是紅，可是每個人畫的界線一定不一樣，我畫綠在這兒，另外一個人畫在那兒，誰來做決定呢？最後政治權力就出來了。我最大，我就定了，我是教授，我就定了，你小研究生、小本科生，能決定嗎？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問題，一個哲學上的問題。在這些具體操作中，我對學生的要求就是，第一，你得知道你看見的、研究的一切是個光譜，另外還有紅外線和紫外線。比如說，用了任何一個詞，像同性戀，都要覺悟還有別的，只是我不知道，或者我看不見、調查不到。我一定得承認還有紅外線和紫外線。第二條，我得承認那個線，我無論怎麼畫，畫到哪兒，都是因為我有權力，最簡單的來說，現在我做的研究是我拿的經費，我有權畫這個。第三條呢，光譜是可以變的。大家都知道光譜是單向度的，可我們日常生活是三百六十度的，所以社會存在、人的存在是個霧狀的結構，是一團霧，霧的邊界能搞清楚嗎？可是我們能不能認識霧？這不是不可知論，哪有霧、哪沒霧？大家不知道嗎？哪的霧薄、哪的霧厚，大家不知道嗎？知道，只是我們定性研究，或者叫質性研究，我們缺乏必要的表述手段，我們沒有必要的概念、論述、命題、推理，所以我們老跟人家說不清楚，所有的人都會攻擊我們：你的質性研究最後就不可

知論了，或者反過來，除了我自己，誰都不能研究我。他們一定會跟你歸咎到這去，我們大陸也碰到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哲學上的原問題，我們做質性研究的這些人或者主張這樣做的人，需要不斷的提出我們的東西，需要將我們的東西表述清楚，讓別人能夠承認我們，我們才能夠把這個霧給說的清楚點。

與會者：我想請問一下，您是生一個女兒而已嗎？有沒有考慮再生一個？現在大陸發現只有一個孩子是有問題的，不是什麼問題啦，就是沒有手足，所以他們之後的小孩就沒有阿姨或舅舅，所以您認為該怎麼解決？

潘綏銘：一九八一年左右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時候，城市裡面的知識分子是非常擁護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孩子多了會拖累，可是大概十年以後，孩子長到十歲左右，大家都後悔了，覺得還是兩個孩子好，現在越老越後悔，每個人都後悔，可是已經過去了，沒有辦法。再說，那個政策非常嚴厲，如果你是二胎懷孕，政府是有權力把你抓走，強迫人工流產的，而且這個人工流產可以到第八個月，那就是硬把那個孩子掏出來，那就是殺人哪，但是都是合法的，在農村都可以實行，城市派幾十輛大汽車把村子包圍住，進去挨家挨戶把婦女揪出來，跟日本鬼子掃蕩的時候一樣。這個不奇怪，九十年代的中國人都知道，現在稍微好了一點，因為農民的生育意願也改變了，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獨生子女的問題，而是人口迅速的減少，農民也只生一個，那就完蛋了，現在你要他生第二個，他也不生了。所以現在強迫的事越來越少，不是因為

政府政策變了而是因為人都不生了，城市裡更明顯。

**與會者：**我有一個對比的問題。比如說在台灣，我們被兩個大黨綁架所以有一些制度和對女性的觀念，大家說女人不能靠她的肉體去賺錢，這是犯法的，其實我覺得這是狗屁，怎麼講？比如說在台灣萬華，很多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媽媽，為了付她爸爸媽媽的醫藥費，她只有去出賣肉體。我們不要叫她妓女，她沒有錯，她也是為了去救別人哪。所以說在我們這種議會制度下，要這些綠的、藍的來決定「不能做肉體買賣」、「這個是下流的、犯法的」，但事實上我們的立法委員也都背著太太跟人家去開旅館，然後被抓到就說：「我向社會大眾道歉」。你跟我們道歉幹嘛？是你們自己定的制度，然後你們自己去違規。我反而喜歡大陸的一條鞭制度，可以或不可以，一句話，不要在那邊兩個面孔。

**潘綏銘：**大陸性產業和「小姐」的問題，跟全世界都不一樣，它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您台灣這個民主政治，是專制政治，因為它把社會主義和小姐套在一起：社會主義、共產黨不能夠有性產業，這也是一個鐵律。只要共產黨在臺上一天，絕不允許，合法化、非罪化也好，這些口號都是在議會民主下才能夠提出來，才有意義。你在中國大陸講合法化和非罪化，一點意義都沒有，它什麼作用都不會起，因為它是個根本的政治問題，是共產黨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娼妓合法，共產黨就不合法，所以絕對沒有這種可能性。當然我們還是要奮鬥，還是要努力，可是要明白問題的癥結不在這兒。

朱偉誠：可否請潘教授把最後講得很快的那個跟NGO的尷尬關係，能不能夠講多一點？

潘綏銘：這也是最近的問題。愛滋病防治開展以後，中國NGO一下子冒出來了，尤其同志組織，現在登記註冊的大概三百多個。各方組織出來以後就面臨一個問題，國際組織和基金會老是希望我們這些做學術的人和NGO結合，大家也都有這個願望，可是到了操作上也存在問題了。第一，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呀，說實在，做草根組織我們根本就做不了，我做不了，我的學生也做不了，都是讀書讀出來的，那我們該怎麼幫助他們？我個人就覺得就是這個學術包裝還是有用的，在大陸跟台灣不一樣，如果學術刊物登一篇對同性戀比較有利的文章，哪怕它是反同性戀，只要它說一點比較有利同性戀的話，就比你發的小冊子或做的宣傳有作用的多，因為它會影響體制內的人。街上那些人他不會看這些東西的，什麼人民日報，只有縣級以上的幹部才看，老百姓絕不會看的，所以我們在這兒做一點努力。可是也碰到了一些具體細節的問題，首先，NGO根本就不相信我們，這個我也坦白承認，我們再三說給你寫個保證書，從署名到什麼的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完全是你的，我一分錢不要，我還得掏錢雇我的研究生幫你寫這個論文，然後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還是不相信，他說你就是拿我們賺錢，就是利用我們，然後你自己出名。我再三的跟他們講，在我們中國的體制裡，我四年前就是二級的教授了，二級教授可以不發表任何論文的，我們是終身養老制，一篇論文也沒有，也是照常拿工資的，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反正在溝通上有困難，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困難，他們

NGO 組織根本不認為需要學術做什麼，這個就沒有辦法溝通了，他們不認為應該在學術雜誌或者學術圈裡面發出聲音，他們認為更多應該用原生態的聲音發出來。我當然知道國際上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我個人也非常支持、非常贊成這樣的作法，可是唯一的我們自己就尷尬了，我們想幫助人家，人家不需要，我們也就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了，目前就是這個尷尬。

**卡維波（主持人）：**這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或許我們下午還可以再繼續討論。

**與會者：**剛才教授有提到說，中國的文化沒有性的概念，只有情跟色，如果把這個擺回儒家的倫理制度來看，情跟色其實是在規範某一種人倫，其實裡頭有隱含著某種對於性制度的規範。有些學者在做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的研究，隨著西方的性理論包括佛洛伊德的引進，好像早期的潘光旦做過一些理論的引進，慢慢有所謂性主體的形成，那這個和傳統儒家談「情」和人倫的問題有個很有趣的文化辯證的過程。剛才教授提到，共產黨成立以後曾經有過性解放的過程，我比較好奇的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行，它對於個人是怎麼一回事、個人和倫理以及社會制度之間的關聯、到後來跟儒家之間的複雜過程、以至於後來所謂「性」在一九八〇年代出現以後，它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新的社會觀感和變化？

**潘綏銘：**非常感謝，我在中國大陸教了三十年書，還沒有學生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台灣水準還是比我們高啊。非常好。我個人看法，我覺得儒家那一套說的完全就是「婚姻」，而不是「性」，是「性關係」。sexuality 是個很大的概念，其中包括性行為、性關係、性感覺等等

，儒家強調的則是性關係，它對性的一切規範都是規範那個「關係」。大家注意到沒有，儒家十三經六十五卷裡面，沒有任何關於性技巧的記載，一點點都沒有，道家有、房中術有。但是儒家不說這個，包括生育、生殖都不說，它僅僅規範性的關係，在儒家裡面就只有婚姻，所以五四運動對於儒家的衝擊第一個就是婚姻，自由結婚，不用媒妁之言。共產黨這一塊，我們在大陸受的教育跟台灣不一樣，就是我們把現在歸罪於孫中山，我們現在說是因為孫中山成立了國民黨，那個時候就強調了領袖制度，已經不是早年同盟會的志同道合者湊在一起，而是變成了一個列寧主義的黨。所以蔣介石沒什麼大錯，他就是繼承了孫中山，就把列寧主義給弄進來了，馬克思主義也沒什麼錯，錯的是列寧主義，他消滅了個人。在黨內的一切黨員是沒有個性的，要犧牲的，我們中國大陸有個口號：「為黨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把你擰在哪兒，你就在哪兒，你個人是沒有價值的，你的一切價值都在黨的事業之中。往上追，誰開始的？就是孫中山開始的。

卡維波（主持人）：整個上午提出了一些相當有意思的問題，吳敏倫最後提到他們的立場跟社會運動和示威遊行保持距離，剛剛潘綏銘也談到了學術和NGO社運之間的一些張力跟緊張關係、不被信任的關係。潘綏銘講到和政府國家的三國演義的關係，然後社會運動裡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傾向，有的是性／別運動的，也有本身是自由派反政府的，也有社會勞工運動的，這都構成一些非常緊張、奇怪、不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們可以多談的問題。還有，潘綏銘教授

談到大陸獨生子女的問題，這在台灣也有可以思考的空間，因為二戰以後流行一個論調：第三世界會貧困，就是因為人口過多，所以在其實是美國為後盾的聯合國的努力下，就到全世界去做人口節育的工作，也到台灣來，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很多立法委員覺得這個是亡黨亡國的事情，千萬不能夠去搞節育，但是最後節育也還是勝利了，所以有「兩男一女恰恰好」，以及後來「一男一女剛剛好」之類的說法。這個節育政策也造成台灣人流墮胎的合法化、自由化，那麼這和我們台灣後來性自由的關係是什麼？我們其實也沒有很多的著墨，但是台灣生育的慢慢減少，還有晚婚現象，就是女人結婚晚，我覺得這都是很客觀導致台灣性革命的因素。潘綏銘教授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提示，就是性與生殖的分開，生殖現象的改變其實更多程度的為兩岸三地的性變化造成一些條件，我覺得這是很意思的。社會主義認為賣淫是一種剝削，有點像是我們講的女人被物化，我在大陸碰過很多婦聯的人，當然她們也是共產黨，她們不是當權的男人，但是她們對於賣淫、嫖娼的態度可能比共產黨男人還要堅決，所以這在左派的思想裡面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奇妙的是說，蘇聯早期又有一段性解放的時間，後來整個農民反彈，說婦女很容易的離婚造成了共產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動搖，所以整個要倒退回去。我覺得這都可以供我們再去思考、再去研究的，我相信對我們台灣和香港，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有很大的借鑑作用。